图书在版编目(IIXf)数据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
Xs O9 7—80109—255—4
Ⅰ.文…
Ⅱ.①布… ②刘…
Ⅲ.①诗歌—文学研究—美国 ②诗歌—文学评论—美国
Ⅳ.1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IIXf 数据核字(98)第16022 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发行部) 66117130(编辑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1999 年1 月第1 版第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12.80 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　序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原本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时

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者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如今，我们又从那无数的读本中挑出几册，我们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诗”与“思”两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上。

这里的几本译作，或偏重于哲学如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和阿兰的《幸福散论》，或偏重于诗歌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纪伯伦的《先知园》和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但它们的特色却都在于“诗”与“思”的融合上，或者说，它们是思想的诗，或诗意的哲学。它们的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

刘文飞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布罗茨基的矛盾

刘文飞

一

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在诗歌与散文的等级划分上总是抬举前者的，他断言：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他精心地论述了诗歌较之于散文的优越：诗歌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诗人因其较少功利的创作态度而可能更接近于文学的本质；诗人能写散文，而散文作家却很少能写诗，诗人较少向散文作家学习，而散文作家却必须向诗人学习，学习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对文学的忠诚。在其他场合，布罗茨基还说过，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的“同义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造和发展。

同样，像其他诗人一样，布罗茨基也不能不写散文。在谈起诗人茨维塔耶娃突然写起散文的原因时，布罗茨基除了茨维塔耶娃当时为生活所迫必须写一些容易发表的散文以挣些稿费这一“原因”之外，还提出了另外几个动因：一是生活的“必需”，一个识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写一首诗，但一个诗人却不可能一生不写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的文字、日常的应用文等等；二是主观的“冲动”，“诗人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写点什么”；三是起决定作用的“对象”，某些题材，如情节性很强的事件、三个人物以上的故事、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忆等等，更宜于用散文来进行描写和叙述。

我们不清楚是哪一种原因促使诗人布罗茨基拿起了写散文的笔。然而，与大多数诗人不一样的是，布罗茨基的散文却写得非常出色。流亡到美国之后，尤其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布罗茨基的各种散文作品不断出现在报刊上和书籍中。也许，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他想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再者，以不是母语的另一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写散文也许比写诗更容易一些。这些散文有些是他先用俄语写作、然后与朋友一起译成英文的，有些是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令人惊奇的是，布罗茨基这些以英文出现的散文却在西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称为“英文范本”。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小于一》曾获全美图书评论奖，他的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在近年出版后也赢得了广泛的反响，甚至曾名列畅销书排行榜。

布罗茨基推崇诗歌，但在他的创作中，散文却似乎赢得了与诗歌平起平坐的地位；布罗茨基是以诗歌获得诺贝尔奖的，是以诗人的身份享誉全球的，可人们却似乎在怀着更大的热情阅读他的散文。是诗人获得了一次无心插柳式的成功，还是命运与布罗茨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们更愿意将布罗茨基关于茨维塔耶娃由诗歌向散文的“转向”所说的那句话反过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散文不过是他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二

本书第一部分所收的五篇文章，是布罗茨基从不同角度对诗歌所作的思考。作为一位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自然会不时关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关注甚至成了他诗歌观念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布罗茨基与政治，也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布罗茨基遭禁、被囚、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得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将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某种意识形态标签。其实，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利用”。布罗茨基到西方后，并没有像大多数流亡作家那样立即对那里的一切大唱赞歌，相反，他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文化的冷漠与专制社会中对个性的压抑相提并论，同视为人类文明的大敌，并给予了同样的抨击。布罗茨基的政治，在大多数场合并非特指一种社会制度或某一个政府组织，而更多的是指一种凌驾于个性之上

的东西，或是柏拉图所言的“专制”。

布罗茨基试图通过对诗歌与政治之关系的探讨，来肯定诗歌的地位和使命。首先，他强调诗歌与政治的不同以及诗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他认为，诗歌（$_{4}3\sigma_{8}6_{3}$）与政治（$_{4}3_{0}\chi_{8}\chi_{7}$）的相同之处仅在于字母$_{4}$和字母$_{3}$，再无他者；其次，他意识到了诗歌与政治的难以相容，在《第二自我》一文中他写道：每一种社会形态，无论是民主制度、专制制度，还是神权制度、意识形态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怀有一种欲缩小诗歌权威的本能愿望，因为诗歌除了能与国家构成竞争以外，还会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疑问，因此，在人类的童年过后，诗歌和诗人便常常是失宠了的。最后，他竭力主张诗歌与政治的平等，并宣称了诗歌较之于政治的优越：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诗歌则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诗歌则倡导革新和创造，拒绝复制、拒绝重复的诗歌，永远是新鲜的明天，而政治则是陈旧的昨日。无论对于单个的人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诗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险装置，唯一的自我捍卫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诺德的两句名言：“美拯救世界”，“用诗歌代替信仰”。

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这本身就已经表明诗歌与政治间有着某种瓜葛，诗歌因而也许是难以绝对独立的；为诗歌谋求崇高地位和使命的布罗茨基，却似乎恰恰是在使诗歌“政治化”。在他的意识和观念中，诗歌不是纯技巧的游戏，更不是什么可有

可无的东西，而是关系到人生、关系到文明的一种存在方式。

三

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讲坛上，布罗茨基感到不安和窘迫，因为他在那个时刻忆起了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马托娃和奥登。布罗茨基心怀感激地提起这五位诗人，认为自己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没有他们，他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作家都将是无足轻重的，他们被诺贝尔奖忽视了，他们共同的沉默在鼓励他代表他们说话。这里的导师名单，肯定不是随意列出的，这五位诗人分别在不同的方面给了布罗茨基以很大的影响；布罗茨基的谦逊也不仅仅是一个感恩的举动，布罗茨基的整个创作，也许就是他们的声音之回声。本书第二部分的五篇文章，正是布罗茨基关于这五位诗人的评介。

在布罗茨基对这些诗人的评介中，我们又感觉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布罗茨基非常注重诗人对语言的处理，称每一位诗人都是语言的历史学家，他赞同华滋华斯关于“诗为最佳词语的最佳排列”的定义，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他却又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他写道:“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东西,实质上就是语言的操纵,他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反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工具”。(《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了某种暗示,真正的诗人,就是始终处在对语言的依赖状态中的人。

布罗茨基将诗歌置于至上的高峰,却将其创造者诗人赶下了山冈,让他们无可奈何地蜷缩在语言之树的浓荫之下。这大约正源自他对语言的忠诚和迷信。布罗茨基认为,语言就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创造中唯一不朽的东西,图书馆比国家更强大,帝国不是依靠军队而是依靠语言来维系的。而诗歌作为语言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结合形式,无疑就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罗茨基称曼德里施塔姆为“文明的孩子”,并广泛地宣传了后者关于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的说法。也正是由此出发,布罗茨基追随曼德里施塔姆和每一位真正的诗人,继续着对词、对语言、对作为“嫁了人的语言”的缪斯、对作为“语言最高表现形式”的诗歌的崇拜。

四

布罗茨基的散文,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文,而常

为一些回忆录、书评、序跋、讲稿、演说稿等，其中也不乏应酬之作，然而，布罗茨基却将这些传统的“平淡”体裁写得富有色彩。从语言风格和主观情感两个方面来看，其散文的出色之处也许就是，他在诸多对立的因素之间谋得了一种平衡。

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视诗高于一切文体的诗人，布罗茨基在写作散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其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散文是严谨的，明显地经过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似乎在用作诗一样的方法作文。也有人说，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这使得他在用英语写作时格外地小心，因而才出现了这样的雕琢。初读他的散文，也许会觉得不够连贯，这正是诗的结构方式被引进散文后的结果。布罗茨基用诗的文字和结构来谈论诗歌和诗人，他的文章往往并不短，这里为分析奥登和弗罗斯特而作的两篇文章都长达数万字，但它们并不使人觉得冗长和枯燥，在这里，讲究的语词、有张力的结构与细致的分析、独到的见解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阅读的疲劳。此外，诸多格言式的句式、令人叫绝的奇喻、字句中潜藏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等等，也强化了其散文的诗化特征。

布罗茨基的散文是既保守又民主，既热忱又冷漠的。一方面，布罗茨基捍卫诗歌的价值和诗人的意义，将诗歌与文化和文明等量齐观，字里行间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的语言民主化的主张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写作（和演讲）时似乎是无所顾忌的，可以随意地谈到父母的做爱、演员的同性恋、湿床单上的公开暴露物等等。此

外，自始至终的怀疑精神和冷漠态度，似是布罗茨基散文的一大特征，读者不难发现他的嘲讽、甚至刻薄，但在这一切之后却又时时能体味出他的一份温情。关于这一点，布罗茨基生前的一位好友、美国耶鲁大学的托马斯·温茨洛瓦教授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他还具有俄语诗歌那种独特的伦理态度——缺少感伤之情，对周围的一切持有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轰动性的题材持有外露的冷漠，但与此同时，却又充满对人的同情，带有对虚伪、谎言和残忍的憎恶。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与其同时代人如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和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等差异甚大，他们诉诸的都是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但与布罗茨基一比，他们却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布罗茨基以自己对诗人之尊严的理解，远远地超越了他们。”

五

诗歌与散文，诗歌与政治，诗人与语言，传统与先锋，保守与民主，冷漠与热忱，悲伤与理智……

其实，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曾自称，他在演说中发表的一系列意见“也许是不严密的，自相矛盾的”。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艾伦在向布罗茨基颁奖时也说到，布罗茨基醉心于发现关联，并用精辟的语言解释它们，而“这些关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可见，这些所谓的“矛盾”并不是我们的发现，更不是我们的强加。

然而，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绝不是浅薄而是深刻，绝

不是问题而是答案。它们是深刻思考的结果，更是进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径。也许，布罗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矛盾却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也许，布罗茨基的这些矛盾，就是古老诗歌与现代社会之矛盾的显现，就是诗人在当代之处境的象征。

一九九八年五月

小 于 一

一

回忆往昔的企图，和探究存在之意义的尝试一样，终将归于失败。这两种努力都让人觉得像一个去抓篮球的婴儿：他的手掌总是要滑脱的。

我对自己生活的记忆相当之少，我所记忆的也多属无关紧要。我此时追忆的这些思想，大部分是在它们出现时就因其重要而曾使我本人产生兴趣。如若不是这样，毫无疑问，它们就最好由别的什么人来加以表达。一个作家的传记就在于他对语言的搓捻。比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上下时，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让我感到真实，仅仅是因为使意识获得了一种疏远的艺术；再者，意识可以立足于意识本身，它可以决定、也可能忽视存在。在那个年纪上，这无疑是一个发现——但这不值得记录，无疑，它最好是由别的人来陈述。但是，由谁首先打破了精神的楔形文字（“存在决定意识”是其一个极佳的范例），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所以，我写下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留下一个平铺直叙的记录（这里没有什么记录，即便有，它也是无足轻重

的记录，因而也是尚未被歪曲的），而是出于那个使作家写作的通常原因——给语言添加一些什么或是向语言索取点什么，这一次面对的是一门外语。我记之甚少的东西，经过在英语中的又一番挑拣，变得更少了。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其上记载，我于1940 年5 月24 日出生在俄国的列宁格勒城，我讨厌这个城市的新名称，而很早以前，当地人则将彼得堡的城名简称为“彼得”。有过这样两个古句：

人民的两肋
被老彼得磨平。

就民族的体验而言，这个城市无疑是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的内涵中不断增多的简陋，也使它越来越像是列宁格勒。此外，对于俄国人的听觉来说，“列宁格勒”一词已经和“建筑”、“香肠”等一样是中性的了。但是，我还是宁愿称它为“彼得”，因为我所记忆的这个城市，是它不像“列宁格勒”的时候，即战争刚刚结束时。灰色和浅绿的建筑物立面上弹痕累累；无尽头的、空旷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车辆；一派肃杀的景象后面，你能发现一些更精致，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贵族味的特征。一张瘦削、冷峻的脸，其空洞窗户的眼睛反射着它那条河流上抽象的波光。一个幸存者是不能用列宁来命名的。

在那些雄伟的、布满弹洞的建筑立面之后，在旧钢琴、破旧的地毯、嵌在笨重铜框中的落满灰尘的绘画和那

些在围困期间没有被铁炉吞食的家具(至少剩有椅子)中间,衰弱的生命正开始复苏。我记得,当我在上学路上经过这些建筑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去想像,在那些墙纸陈旧、起泡的房间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我得说,从这些建筑立面和门廊——这些古典的、现代的、折衷的、带有雕着神话动物和人物头像的圆柱的立面和门廊,从立面和门廊上支撑着阳台的装饰和女像,从立面和门廊入口处的壁龛中的石像躯体,我学到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比我后来从任何书本上得到的知识都要多。希腊,罗马,埃及——那儿什么都有,它们都在轰炸中遭到了炮弹的砍削。此外,从那条朦胧的、闪亮的、流向波罗的海的河,从那条偶尔有拖轮在其中的激流里逆水而行的河,我学到的关于无穷和斯多葛主义的知识,比我从数学家和季诺那儿学到的还要多。

……①

我一时还难以相信,性格形成的所有线索均可以在童年生活中被发见。将近三代的俄国人一直居住在公寓和狭窄的房间里,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假装睡着的时候做爱。然后,是战争、饥饿、离家的或伤残的父亲们、手上磨出老茧的母亲们、学校里的官方谎言和家庭里的非官方谎言。艰难的冬天,难看的衣服,夏令营中将我们的湿床单公开展露,以及在他人面前提及此类事情。然后,一面

① 此处略去作者关于列宁的一段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